

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陈夫龙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摘要: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其中既有显著的成就,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对该课题的研究成果加以述评,并对其创新思路作以初步前瞻,对于深化该课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关键词:新文学作家;侠文化;关系;研究述评;前瞻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7)04-0044-06

以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把中国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文本纳入侠文化视野加以整体观照和具体解读,考察并发掘它们之间在特定时代的互动关系及应有价值,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或学术立场的诸多原因,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只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受到人们的关注,才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

(一)鲁迅与侠文化

韩云波《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1],可以说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这一课题研究方面有开拓之功。作者从“文化基因论”出发,开篇指出:“春秋时代,儒墨并称显学,其后韩非以儒侠对举,在中国历史上,墨、侠及其文化传统作为儒的对立面之一,植根人心,形成国民性中的‘侠性’心态,到近现代愈益复杂。”并且认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鲁迅对侠文化传统作了深刻的改造,至今犹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难能可贵的是,在具体论述中,作者把鲁迅对侠文化传统的改造纳入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格局,指出其终极目的在于国民性的根本改造。这样就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之间找到了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新文学作家在反思、批判与改造侠文化的同时,汲取了侠文化中合理积极的质素作为国民性改造的宝贵精神资源,从而打破了以往认为“五四以来新文学作

家对侠文化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偏见或定论,这是韩文可贵的创新处和闪光点。另外,周葱秀《瞿秋白鲁迅论侠文化》认为,鲁迅对侠文化基本上持批判态度^[2];汤晨光《鲁迅与墨侠精神》重点阐述了侠文化精神在鲁迅个性气质和著作文本中的积淀与传承,同时也指出了鲁迅对侠文化的适度批判^[3];袁良骏《鲁迅与“侠”文化》认为,鲁迅以发展的眼光对待侠文化,但对侠义小说却贬大于褒^[4]。总的来看,上述研究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通过论述鲁迅与侠文化之间的互动来更深入地探讨关于他致力于新文化建构与理想人格建构的问题。

严家炎在专著《金庸小说论稿》中,针对有人以鲁迅批判侠文化来否定武侠小说指出,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与侠文化有着复杂关系的还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1926年写的《铸剑》,可以说是一篇现代武侠小说,主人公黑色人就是一位代人向暴君复仇的侠士,而且其名字“宴之敖者”,就是鲁迅自己曾经用过的笔名,足见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喜爱。同时,针对鄢烈山《拒绝金庸》以鲁迅《流氓的变迁》作为立论根据的谬说给以反驳。他认为鲁迅也肯定“墨子之徒为侠”,直到1930年代,还写了《理水》、《非攻》两篇小说,颂扬禹和墨子为民请命、埋头苦干、急人所难、不求名利的那种墨侠精神;同时也特别警惕侠在官方压迫和引诱下的变质、堕落现象,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作了论述和揭露。有人如鄢烈山等依据此文而断章取义,竟说鲁迅视侠士为流氓,或者说流氓的祖先为侠,对侠文化完全否定,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误解

* 收稿日期:2006-12-20

作者简介:陈夫龙(1975-),男,山东枣庄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或曲解^{[5]24-25}。严家炎从精英作家身上发现了其对边缘文化或亚文化的精神承传与价值体认,作为长期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权威专家来说,在文化多元并存的世纪之交,这种视界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拓展、思维的突破以及寻求新的生长点,是可资借鉴的。

(二) 郭沫若与侠文化

在郭沫若与侠文化关系研究方面,原西南师范大学的韩云波和王本朝可以说几乎同时亮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睿智的见解和严密的逻辑论述了郭沫若与侠文化之间复杂而深刻的精神联系,刷新了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的学术时空。

韩云波的系列论文《郭沫若历史文学与士文化传统——初论郭沫若的儒侠统一观》^[6]、《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侠文化内涵》^[7]、《郭沫若与中国侠文化》^[8],立足于传统侠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现代承传,侧重于文本分析和作家主体的精神审视,把郭沫若纳入侠文化话语语境中加以学理考察和现代阐释;结合作家的个性气质和人生经历,或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究郭沫若人格理想中儒侠统一的文化内涵,或通过将抗战史剧置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文本分析来肯定作家对传统侠文化精神资源积极意义的发掘与张扬。王本朝的系列论文《郭沫若与侠义精神》^[9]、《郭沫若与侠文化》^[10]、《论郭沫若历史剧与侠文化的现代改造》^[11],结合郭沫若的精神个性与人生际遇,或通过作品文本特别是历史剧的分析较深入地论述郭沫若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阐释与改造,或从作家主体的精神结构和情感世界层面探究郭沫若的侠性气概,发掘传统侠文化在特定时代的价值意义。另外,廖传江《郭沫若与中国侠文化》从郭沫若与中国传统侠文化的联系中探讨了侠文化对他的人格、心理乃至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指出青年时代的郭沫若是一位站在时代潮流前端的顶天立地的儒侠形象^[12]。

从整体上看,韩、王、廖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在论述郭沫若以审美艺术形式塑造、建构现代精神人格和丰富复杂的情感世界时所持精神立场与现实意识形态的矛盾纠葛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三) 老舍与侠文化

汤晨光《老舍与侠文化》探讨了侠文化在老舍个性气质和作品文本中的积淀与承传,指出他的描写是改造国民性格的一种努力^[13]。何云贵《老舍与中国武侠文化》主要从思想层面和叙事艺术层面全面考察了侠文化对老舍的复杂影响,特别强调弘扬武侠文化的积极因子成为老舍承传武侠文化的基本态度^[14]。王卫东《老舍小说侠义情结探源》,探究了老舍小说侠

义情结的深层根源,指出叙述者的小人物立场成就了其小说中的侠义大观,叙述者与革命大潮的疏离使其小说中的革命者更像侠客^[15]。

严家炎指出老舍“是一位童年就从传统曲艺和小说作品中深受侠文化影响的作家”^{[5]25},并简要分析了他的一些受侠文化影响的作品,着重指出“老舍小说决不是廉价的‘革命文学’,但书中那种凛然正气,侠义情怀,无疑曾激励旧时代广大读者走上同情革命的道路”^{[5]26}。徐德明的专著《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对老舍《断魂枪》、《上任》等进行了个案分析,认为《断魂枪》是一个武侠长篇的压缩,《上任》是武侠小说的变种——帮会小说。他说:“《断魂枪》联系着中国武侠及其艺术表现的两千多年历史,它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以现实的态度确定武侠在社会转型期的处境、地位与存在价值。”^{[16]275}《上任》的亮点在于把传统材料赋予了现代意识内容,成为一个政治寓言。通过分析指出,老舍对中国1930年代小说的贡献在于将传统诗学文化中的世俗题材在现代意识指导下提升,达到了雅俗整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

这几篇论文和严家炎、徐德明的有关论述,分别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老舍与侠文化的精神联系,有值得肯定的见解和学术价值,特别是徐德明的论述,有利于研究思路的拓展。但同时也忽略了老舍的现代生命体验尤其是在旅英期间强烈的文化反差对他的精神刺激与侠文化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他最初以现代意识观照,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封建文化传统,而抗战期间转为对民族精神(包括侠义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歌颂,其转化的内在机制如何,他的文化立场怎样,并没有加以深入探究。

(四) 沈从文、萧军与侠文化

郑英杰《沈从文与湘西游侠精神》,分析了湘西游侠精神的特点和成因及其在沈从文身上的体现^[17]。陈娟《萧军的小说与侠文化精神》主要通过论述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与《第三代》中所表现出的对侠文化精神的体认和发展,指出小说人物胡子——抗日英雄及其表现的侠义精神对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激发人民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18]。原西南师范大学200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富治平的学位论文《侠文化与萧军小说研究》,主要通过萧军的生平、小说文本、叙述模式进行考察,探寻他对侠文化精神的独特体验^[19]。

总起来看,前者在学理上有欠深入,显得有些单薄。后者虽能较深入地探讨萧军独具个性的侠文化精神的成因与表现,但未能结合研究对象的人格心理和文化理想进行探究,未免有美中不足之嫌。

(五)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综合研究

杨经建的系列论文《崇侠意识:20世纪小说的一种文化心理取向——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20]、《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21]、《侠义精神与20世纪小说创作》^[22],都涉及到了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关系。另外,杨经建为《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学》撰写的第五章《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实为其论文《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的翻版^[23]。杨经建在论文中提到了鲁迅、老舍、艾芜和萧军等新文学作家,肯定了他们在侠文化意识的激励下通过小说文本传达出的复仇精神、抗争精神和强悍的生命意志。由于作者把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乃至中国文学纳入了侠文化视野的观照下,所以,并不能充分地剖析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错综复杂的纠葛。从整体上看,作者的视野宏阔,论文的学术容量较大,学术价值较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等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侠文化和武侠小说大都不屑一顾,对其广泛流行持非常严厉的批判乃至彻底否定态度。在他们的心目中,侠文化与武侠小说是毒害民族精神和青少年的“迷魂汤”。针对他们的观点,严家炎指出:“这种认为武侠小说‘制造幻想’、乃‘精神鸦片’的看法却是站在革命者立场上从左的方面来否定的。”^{[5]18}同时认为他们的观点“在当时或许自有其针对性,结论却未免过于简单”^{[5]19}。可以说,严家炎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这些五四先驱观点的偏颇、结论的草率,为我们重评五四开拓了全新的视角。陈平原在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中,通过分析茅盾、郑振铎、瞿秋白对武侠小说和侠文化的有关论述,着重指出:“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的这些批评,大体上是中肯的。可过分强调小说的教诲功能而完全否认其娱乐色彩,并进而从思想倾向上全盘否定武侠小说,则又未必恰当。……指责作家有意毒害青少年,或者赞扬其弘扬爱国精神,其实都不得要领。”^[24]陈平原的观点比较客观、公允,找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由于两位论者的着笔处不重在评价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对侠文化的态度,所以,在挖掘这种态度背后所潜藏的历史的和思想文化的深刻根源方面,做得还不够深入。

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对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关系有所论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侠义作为一种比喻符号而流通不辍,仍是有待我们探索的论题。当启蒙作家自膺为新一代的良心,明察秋毫,谴责不公时,或者更激进的,当他们成为今之侠者,为求正义而不惜背离法律时,他们以最尖锐的方式,质疑并另行

打造社会正义的功用。为了践行他们的使命感,这些集文人与侠士于一身的作家以笔代剑,挑战威权。他们所显现的无私、叛逆、勇气、自我牺牲的行动,并不全都得归因于西洋文化的影响;它们也可以是传统侠义行为改头换面的作风。”^{[25]143}同时他也指出:“在中国现代小说与现实中,有多少叛逆的‘新青年’曾以激进的个人主义起家,却臣服于集体乌托邦的号召下。他们奉献一己的资质勇气,以赢得民族和政党的胜利,这些倾向,其实与晚清男女侠客向(君主)极权顶礼膜拜的趋向,有了诡谲的照映。这些‘新青年’所经历的驯化过程,不禁令人想起晚清男女群侠类似的命运。”^{[25]144}他的研究视角可以给我们以方法论上的重要启示,但对其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上的偏颇,应该有所明鉴。

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但问题仍不能忽视。总体上来看,1990年代关于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研究成果较多,并且主要集中在鲁迅(4篇)、郭沫若(7篇)和老舍(3篇)身上,这其中自有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激发。但进入21世纪以来,1990年代的研究者没有围绕该课题继续研究下去,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学术文化现象。同时,世纪之初,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大都沿袭以往的思路,在方法论和研究视野上较前并没有新的突破,甚至还有重复他人乃至重复自己的现象发生。尽管海外汉学家也有相关的论述,但毕竟很少,也缺乏系统、深入。

通过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可以发现,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这一研究课题方面,大都为单篇论文,或散见于相关的学术著作中,基本上是单个作家研究。尽管有的论文把作家纳入侠文化的视野中加以审美观照,但由于篇幅限制或论述需要,并没有把作家侠性心态的形成与侠文化的历史流变、作家侠性心态的发展与其所处时代的特定精神气候尤其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纠葛结合起来。同时,没有把具有侠性气质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其与侠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至今尚未发现有较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问世。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就研究主体而言,研究者没有真正地处理好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对峙与对话之间的辩证关系。严家炎指出:“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高雅和通俗两部分既相互冲击,又相互推动,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6]雅俗对峙构成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并且,雅和俗都是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不同

的时代、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同时，雅俗又是能够相融的，能够不断地实现对话。所以在雅俗之间的相生相克中，文学生态总是以不平衡——平衡——不平衡或激变或渐变或和谐发展的轨迹向前演进的。我们知道，侠文化属于俗文化的范畴，而新文学作家则是精英文化的生产者与传播者，要把这两者纠合在一起，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处理好雅俗对峙与对话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能把侠文化的发展、流变与新文学作家心态的嬗变、特定时代精神的演进、国民性批判等有机结合起来，以揭示新文学作家的精英意识与侠文化之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复杂联系。

第二，就研究对象来说，新文学作家有关侠文化方面的论述和创作相对不多，造成资料搜集的困难。当然，新文学作家主要从事新文学创作，致力于启蒙、革命、救亡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境遇里，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新文学作家属于弱势群体，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知，以笔为剑，向一切社会不公、一切强权和一切黑暗挑战，所表现出来的无私、无畏、反叛、正义、自我牺牲等精神品质和高贵行为——传统侠义精神的现代传承，无不沉潜于他们的理论文本和创作文本之中。韩云波指出：“中国侠文化在受到主流文化‘改造’的同时，也在影响着主流文化，在历史的矛盾统一中，中国侠文化始终保持着惟中国而有‘侠’的特色。”^[27]事实上确实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作家以现代意识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和主体性再造，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民族文化和理想人格的双重建构。同时，侠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精神也在影响着主流文化和新文学作家。因此，尽管存在着直接资料不足困难，但从新文学作家的理论文本与创作文本及其实践行为等方面，应该能够挖掘出丰厚而深刻的精神资源。

第三，关于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仍然没有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1990年代从事过该课题研究的研究者并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尽管《通俗文学评论》作为当时大陆唯一的通俗文学研究专业刊物，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特别是侠文化、侠文学研究史上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但它仅仅走完1992—1998年这光辉的瞬间便中途夭折，并没有完成它应有的历史使命，其中关于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数量几乎为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于1993年第1期开办了“中国侠文化研究”专栏，对于推进侠文化研究有开创之功，但该专栏没有坚持下去，与《通俗文学评论》的命运相似，并且编发的论

文都是古代文学、文化领域的。从2004年第4期开始，由《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与《今古传奇》（武侠版）联合开办的“21世纪中国侠文化”专栏，接续了曾于1993年点燃的学术薪火，为侠文化研究提供了成果发表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与契机。自开办以来，该专栏发表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论文，但有关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方面的论文却相对短缺。在2006年第4期，该专栏编发了陈夫龙的论文《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在鲁迅与侠文化关系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鲁迅入手而集中论述了“反叛”^[28]。这是该专栏自开办以来编发的第一篇关于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的研究论文，它至少向学界发出了一个信号：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这一课题仍然具有学术活力，侠文化研究仍然具有蕴涵丰厚的当下性意义。这应该引起学界的关注。

从既有成果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这一课题尚存新的学术空间有待于开拓。

—

我认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这一课题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关键在于研究视角的创新和研究思路的拓展。

大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墨、法等各家构成的一个博大精深的结构体系，侠文化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维。虽然“与儒、道、佛文化相比，侠文化是一种缺乏精确的话语外延及严格的语义规范的文化构成类型，以致在传统文化结构中长期处于若即若离、若隐若现、乃至有形无相的状态”^[21]，尽管直到20世纪80年代侠文化作为一个话语概念才被学界基本接受，但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侠文化中行侠仗义、扶危济困、除暴安良、舍生取义以及追求人格独立和维护生命尊严等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早已作为集体无意识积淀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深层，形成民族性中的侠性心态和侠义精神。正是由于侠文化精神的积淀和承传，再加上积贫积弱的国情，在近代中国兴起了规模宏大的“尚武”思潮。从侠文化中汲取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质素作为传统文化与人格更新再造的精神资源，是在近代“尚武”思潮中出现的新民强国之梦的思路。“那个时代（指晚清——引者注）里，带有‘新民’精神色彩的小说戏曲中并不缺少侠义的形象，那是志士的变形，侠义的精神与反对专制的革命豪情联系在一起，而一般武侠小说中与‘侠’密切相连的‘武’却被放置于不太重要的位置上，如鉴湖女

侠仗瑾等。”^{[16]62}梁启超倡导“尚武”、“任侠”精神以新民强国,是晚清“尚武”思潮的集大成者,直接开启了中国新文学作家从侠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进行新文化建构和理想人格建构的先河。所有这一切,确实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正视侠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现代传承以及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境遇和知识分子的心态,以便从中汲取合理、有益的精神资源。

蔡翔认为,知识分子有一种江湖情结,它包括“趋人之急”与知识分子的拯救渴望、公道与正义的理性要求、“酬知己”与知识分子的“明主”情结、生命方式的美的发现,知识分子也对侠进行着“误读与改造”,这包括正义化的侠、伦理化的侠、山林化的侠、文人化的侠^[29]。中国新文学作家就是具有侠的气质的文人知识分子或“文人化的侠”,他们对待侠文化的态度是颇为复杂的。在五四启蒙话语语境和以后的革命话语乃至政治话语语境、救亡话语语境中,新文学作家对待侠文化的态度被历史地单一化为“批判”,但却忽略了其对侠文化分析评价中“建构”的一面。究其实,乃在于有些新文学作家及其研究者混淆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侠文化话语、知识精英理想价值建构的侠文化话语、民间世俗理想价值期待的侠文化话语、社会末流的侠文化话语四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以致于他们在不经意间有成为政治权力无意识同谋的嫌疑。有的新文学作家以知识精英话语,抱持着侠文化的泛滥关乎民族国家命运的警惕来批判乃至否定侠文化,如茅盾、郑振铎、瞿秋白等。“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30]客观地说,他们的评判确实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时代的进步意义。五四知识精英把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们相信只有争得国民精神的普遍解放,才能拯救当时的中国社会,才能建设新文化。但为了与传统文化争夺话语乃至文化领导权,在激进地全面反传统、用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来建设中国新文化思想主张的引领下,抹煞了侠文化话语的理想精神价值与侠文化话语末流的本质区别。我在此指出激进主义在新文化建设方案上的不足,并不意味着认同主张新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儒家传统基础上的保守主义,更不是借此为曾被某些五四新文学作家视为“迷魂汤”的武侠小说和侠文化做翻案文章。其实关于新文化建设的所谓“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二元对立的划分,并不符合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这种命名自有其历史的和认识论的局限性,不能真实地反映

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真相。

王德威指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侠义作为一种比喻符号而流通不辍,仍是有待我们探索的论题。当启蒙作家自膺为新一代的良心,明察秋毫,谴责不公时,或者更激进的,当他们成为今之侠者,为求正义而不惜背离法律时,他们以最尖锐的方式,质疑并另行打造社会正义的功用。为了践行他们的使命感,这些集文人与侠士于一身的作家以笔代剑,挑战威权。他们所显现的无私、叛逆、勇气、自我牺牲的行动,并不全都得归因于西洋文化的影响;它们也可以是传统侠义行为改头换面的作风。”^{[25]143}在此,不妨把这段话中“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说法替换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时期”。我认为,这段话至少可以给我们以下启示:一、侠义精神作为一种民族集体无意识深深地积淀于新文学作家的人格结构和文化心理之中,成为人格精神的象征。二、新文学作家精神结构中沉潜的侠义质素和感时忧国情怀在西方启蒙思潮的影响下,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境遇中被激活并焕发为反叛传统、维护社会正义的热情。可以说,传统文化是近现代知识分子接受并汲取西方文化的土壤。三、尽管有些启蒙作家以激进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主张全面打倒儒家传统,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建设中国新文化,但由于传统文化(当然包括侠文化)的积淀与承传,早已内化为他们感受世界、体悟人生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结构的宝贵质素,不可能从根本上割裂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从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可管窥见其把传统侠义精神转化为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现代符码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从而颠覆那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从根本上割断了与传统文化、文学的联系”及与此相类似的论调。

通过以上分析,要想在这一课题研究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就必须超越过去的研究视角,拓展以往的研究思路。我认为,在研究视角上,可以引入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学、地域文化学等理论,深化对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情感精神、人格心理分析,以开拓新的理论视野。在研究思路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作出尝试。一方面,以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的关系为切入点,在侠文化的宏阔视野下对鲁迅、郭沫若、老舍、沈从文、蒋光慈、艾芜、萧军等新文学作家及其作品文本加以整体观照和具体解读,考察在中国传统文化出现危机、发生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精神气候和独特的人生经历及生命体验怎样激活了他们潜意识中的侠义精神,通过探究新文学作家侠性心态的成因及其嬗变,从侠义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创作主体身上的体现及其作品文本中的艺术呈现发掘出

应有的价值,探讨他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现实改造思路和新文化建设主张。同时,对茅盾、郑振铎和瞿秋白等对武侠小说和侠文化的批评话语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进而重返当时的历史语境,追问新文学作家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中非主流文化或边缘文化资源的。一方面,通过透视侠义精神在新文学作家人格心理中的积淀、承传及演进轨迹,可以对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心理、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及其由个人主义的启蒙精英话语逐步纳入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矛盾纠葛进行细致精微的体察,以进一步加深对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变迁的认识和理解。因此,这一课题既具有重要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同时也潜隐着深刻的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不仅有利于丰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角,而且还能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做出更为生动、更富有历史意味的阐释。

参考文献:

- [1] 韩云波. 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J]. 鲁迅研究月刊,1992(1):21-28.
- [2] 周葱秀. 瞿秋白鲁迅论侠文化[J]. 鲁迅研究月刊,1995(4):7-12.
- [3] 汤晨光. 鲁迅与墨侠精神[J]. 鲁迅研究月刊,1997(1):22-28.
- [4] 袁良骏. 鲁迅与“侠”文化[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3):29-33.
- [5] 严家炎. 金庸小说论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6] 韩云波. 郭沫若历史文学与士文化传统——初论郭沫若的儒侠统一观[J]. 郭沫若学刊,1992(4):45-49.
- [7] 韩云波.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的侠文化内涵[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72-76,62.
- [8] 韩云波. 郭沫若与中国侠文化[J]. 郭沫若学刊,1993(3):22-29,71.
- [9] 王本朝. 郭沫若与侠义精神[J]. 文史杂志,1992(6):34-35.
- [10] 王本朝. 郭沫若与侠文化[J]. 贵州社会科学,1993(3):80-84.
- [11] 王本朝. 论郭沫若历史剧与侠文化的现代改造[J]. 求索,

- 1995(5):92-95.
- [12] 廖传江. 郭沫若与中国侠文化[J]. 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0(4):57-60.
- [13] 汤晨光. 老舍与侠文化[J]. 齐鲁学刊,1996(5):26-28.
- [14] 何云贵. 老舍与中国武侠文化[J]. 江西社会科学,2003(9):40-43.
- [15] 王卫东. 老舍小说侠义情结探源[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39-43.
- [16] 徐德明. 中国现代小说雅俗流变与整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17] 郑英杰. 沈从文与湘西游侠精神[J]. 船山学刊,2000(4):113-116.
- [18] 陈娟. 萧军的小说与侠文化精神[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4):149-150.
- [19] 富治平. 侠文化与萧军小说研究[D]. 西南师范大学,2005.
- [20] 杨经建. 崇侠意识:20世纪小说的一种文化心理取向——侠文化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J]. 学海,2003(1):191-196.
- [21] 杨经建. 侠文化与20世纪中国小说[J]. 文史哲,2003(4):156-161.
- [22] 杨经建. 侠义精神与20世纪小说创作[J]. 云南社会科学,2004(1):130-134.
- [23] 罗成琰. 百年文学与传统文化[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252-311.
- [24] 陈平原. 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66.
- [25] (美)王德威.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 宋伟杰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6] 严家炎. 文学的雅俗对峙与金庸的历史地位[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5):130-134.
- [27] 韩云波. 中国侠文化:积淀与承传·自序[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 [28] 陈夫龙. 批判中建构,论鲁迅与侠文化精神[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26-31.
- [29] 蔡翔. 知识分子与江湖文化[J]. 上海文论,1992(5).
- [30]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责任编辑 韩云波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Writers in China and the Chivalrous Culture and the Prospect

CHEN Fu-l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Abstract: As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for research,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w literature writers in China and the chivalrous culture has been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y the researchers. A lot of results including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d the obvious imperfections have been made. To give reviews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foresight of the creative writing skills is of great necessity in deepening studies in this area.

Key words: the new literature writers in China; the chivalrous culture; the relations; a review of researches; prospect